

# 第二次國共合作奠定了抗日戰爭勝利的初步基礎

毛 磊\*

第二次國共合作是取得抗日戰爭勝利的重要法寶。而第二次國共合作卻經歷了由醞釀、形成、高峰、摩擦、局部破裂到完全破裂的六個階段。而第三階段即高峰階段，也稱“蜜月期”，是指 1938 年的“武漢抗戰”時期。也就是說第二次國共合作的“蜜月期”就是“武漢抗戰”時期。正是由於在 1938 年國共合作得很好，才取得抗戰的重大成果，就是奠定了打敗日本侵略的初步基礎。在紀念抗戰勝利 70 週年之際，總結這個歷史經驗，對於實現“一國兩制”和平統一祖國有着重要的現實意義。

## 一、“武漢抗戰”是八年抗戰中相對獨立的階段

“武漢抗戰”，既不是指武漢市及其周邊地區的局部區域性抗戰，也不僅僅局限於軍事範疇的武漢會戰，而是涵蓋了 1937 年 12 月 13 日南京失守至 1938 年底這一時期全國範圍內的抗日鬥爭。武漢抗戰在八年抗戰中具有相對的獨立性，或者說“武漢抗戰時期”是八年抗戰的一個“斷代”史。

把“武漢抗戰”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階段，不僅有足夠的歷史事實根據，而且也有充分的理論根據，即毛澤東和周恩來關於“武漢抗戰”這個概念的論述。1937 年 11 月 12 日，毛澤東就把上海太原失陷前後作為抗戰史的一個分界綫。他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後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一文中，明確指出此時的形勢是：“在華北，以國民黨為主體的正規戰爭已經

結束，以共產黨為主體的遊擊戰爭進入主要地位。在江浙，國民黨的戰綫已被擊破，日寇正向南京和長江流域進攻。國民黨的片面抗戰已表現不能持久。”他還提出：“目前是處在從片面抗戰到全面抗戰的過渡期中。片面抗戰已經無力持久，全面抗戰還沒有來到。這是一個青黃不接的危機嚴重的過渡期。”<sup>1</sup> 歷史發展證明毛澤東科學預見的正確性。由片面抗戰過渡到全面抗戰的主要內容是中共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深入敵後，放手發動億萬群眾開展遊擊戰爭創建抗日根據地。同時，國民黨雖然不可能由片面抗戰完全轉到全面抗戰路綫上來，但它在這個階段裏，對群眾抗日行動限制相對較少。不管全國是否完全實現這個過渡，但毛澤東把上海太原失陷後作為一個“過渡期”，把抗戰初期的 16 個月劃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則是一個客觀存在的事實。武漢抗戰末期，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根據毛澤東的報告作出的政治決議案指出：“目前的抗戰，正處在抗日持久戰第一階段轉到第二階段的過渡時期。”<sup>2</sup> 這裏又提出一個“過渡時期”，即由我之戰略防禦向戰略相持階段過渡。

把這兩個“過渡期”聯繫起來考察，不難發現“武漢抗戰時期”正是處在這兩個過渡期的中間，這就為把“武漢抗戰時期”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階段提供了理論根據。只是還沒有在文字上作出明確的表述罷了。

周恩來作為中共中央代表常駐於國民政府的政治中心，和國民黨接觸頻繁，對整個抗戰形勢的認識準確而深刻。他在總攬全局的基礎上提出了“武漢抗戰”這個科學的概念，並作出正式的文字上的表述。

\*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

1938年10月10日，為紀念辛亥革命27週年，周恩來在《辛亥、北伐與抗戰》一文中，是把1938年的抗戰作為一個獨立時期來看待的。他明確指出：“武漢是中華民國的誕生地，是大革命北伐時代的最高峰，現在又是全中華民族抗戰的中心”；“辛亥、北伐、抗戰，這三個歷史時期，將造成中華民族復興的大業。”<sup>3</sup>在中國共產黨召開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周恩來作了《論統一戰綫》的報告，在報告中，他把1927年北伐到武漢後的武漢國民政府時期稱為“第一個武漢時期”，而把1938年稱為“第二個武漢時期”。報告中曾七次出現“武漢時期”、“1938年武漢時期”、“第二個武漢時期”、“抗戰的武漢時期”。<sup>4</sup>周恩來在這裏已非常明確地提出武漢抗戰是作為一個獨立“時期”載入抗戰史冊的。因此，把1938年作為一個獨立的“武漢抗戰時期”是有充分理論根據的。

中共中央指出：“上海失去後，救亡運動中心將轉移至武漢”<sup>5</sup>，後來又在致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電文中明確提到：“我們的首都武漢”<sup>6</sup>，所以，將1938年以武漢為中心的抗戰；稱之為“武漢抗戰時期”，有着充分的歷史文獻根據。（以下均簡稱為武漢抗戰不加引號，特此說明）。

由台灣學者張其昀主編的《抗日戰史》把八年抗戰劃分為二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37年7月7日到1938年底為之戰略守勢時期，而武漢淪陷後為之第二期作戰，稱之為持久戰時期。與中共的上述劃法基本上相吻合。最後需要說明的是從軍事上講，武漢抗戰的時間還應推遲到1939年的6月份，因為1939年春進行的南昌會戰仍是武漢會戰的繼續，日軍在進攻武漢的作戰計劃中是先攻佔南昌後再向武漢進攻，不料被薛岳兵團在萬家嶺消滅其106師團，因而放棄攻南昌而攻武漢，當1938年攻下武漢後，遂於1939年春進攻南昌。所以，南昌會戰實為武漢會戰的組成部分。日軍為了鞏固其武漢西側的安全，遂於1939年夏季向隨縣等地進攻，遂為隨棗會戰。台灣學者把隨棗會戰稱為武漢會戰的尾聲是有道理的，因而從軍事上講，武漢抗戰的時間下限是1939年5月份是有根據的。所以，從廣義上講武漢抗戰的時間應是從1937年12月到1939年6月，有將近20個月的時間。

## 二、武漢抗戰時期是第二次國共合作發展的高峰

進入武漢抗戰伊始，抗日戰爭的形勢更加嚴峻，迫使國民黨及其政府比較認真地對待國內政治格局的改善、長期持久抗戰等重大問題。國共兩黨調整政策，迅速在抗日禦侮及一些重大問題上達成共識。國民黨在漢口召開全國臨時代表大會。制定《中國國民黨抗戰建國綱領》，宣稱：“中國國民黨領導全國從事於抗戰建國之大業，欲求抗戰必勝，建國必成，固有賴於本黨同志之努力，尤須全國人民戮力同心，共同擔負。因此，本黨請求全國人民捐棄成見，破除畛域，集中意志，統一行動。”<sup>7</sup>中共中央致電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強調指出：“當大敵當前，河山破碎之時，我們炎黃子孫，首先是我國共兩黨同志，能更加親密攜手，共禦外侮，這不僅證實我中華民族的偉大，而且顯示我中華民族的復興。”<sup>8</sup>國共兩黨在團結抗日的問題上進一步明確了共同的目標，共產黨基本上贊成國民黨的《抗戰建國綱領》。認為它與中共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的精神是相通的。承認國民黨的權威，國民黨也給予中共抗日武裝一定的物資支持，從1937年9月到1938年10月國民政府每月給八路軍的軍費達61.4萬元。並給一定數量的軍事裝備。國民黨同意於1937年底在武漢成立新四軍軍部。國民黨允許中共在國統區設立八路軍辦事處和新四軍辦事處、留守處，增強了中共在這些地區的影響，如在漢口創辦《新華日報》這是中共在國統區第一個公開的報紙，影響很大。尤其是武漢八路軍辦事處，成為八路軍與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直接聯繫的公開合法機構。中共中央派出代表團常駐武漢，成為聯繫兩黨的紐帶。周恩來等人多次同蔣介石、陳立夫等會談，協商處理兩黨合作的各種事宜，特別是成立了“兩黨關係委員會”。是國共關係史上惟一的一次合作組織形式。雖然時間不長，但說明武漢抗戰時期的國共關係之密切程度。應蔣介石、陳誠的邀請，周恩來出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中共中央的領導人陳紹禹、周恩來、博古等，以及八路軍、新四軍的主要將領朱德、葉劍英等。在武漢和國民黨將領進行廣泛的接觸，堅定了各方團結抗戰的信心。可

以說，“武漢抗戰時期”是第二次國共合作的“蜜月”。正如毛澤東所說的那樣：“國民黨在1937年和1938年，抗戰是比較努力的，同我黨的關係也比較好”。這正是對武漢抗戰時期國共關係的高度概括和總結。

國共兩黨在政治上的團結與合作，在軍事上也體現出來：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配合得較好，是“武漢抗戰時期”的顯著特點。武漢抗戰期間，正面戰場掩護了敵後戰場的開闢；而敵後戰場牽制大批日軍也支援了正面戰場的作戰，國民黨軍隊才能作到以空間換時間、積小勝為大勝的效果。沒有國共兩黨兩個戰場的密切配合，要取得一系列勝利是不可能的。如在徐州會戰中，中共就作了很好的配合。周恩來與葉劍英到白崇禧寓所向其建議徐州會戰的作戰方針：“在津浦綫南段，採取以運動戰為主，遊擊戰為輔”，“在徐州以北採取陣地戰與運動戰相結合的方針，守點打援，以達到各個擊破的目的”。此方針對徐州會戰發揮了很好的作用。在具體作戰行動上，中共也有很好的配合。中共山東省委組織開展遊擊戰爭，有力配合國軍的作戰。中共蘇魯豫皖特委郭子化與李宗仁聯繫，組織人民群眾支援台兒莊作戰。新四軍第4支隊張雲逸部在津浦路南段配合李宗仁作戰。陳再道率129師386旅在濟南附近展開遊擊戰爭，有力支援了台兒莊作戰。由於兩黨合作很好，才有台兒莊大捷。正如陳誠對台兒莊大捷的評價：“台兒莊之戰勝，在戰略上觀察乃各戰場我軍努力之總和，不可視為一戰區之勝利。”<sup>9</sup>在武漢會戰中，國共兩黨配合得也很好。中共中央明確要求八路軍各部“積極在華北各地活動，吸引更多的敵人於自己的周圍，以牽制敵人前進”。正因為此，日軍在制訂武漢會戰計劃中也明確規定：“南取廣州、中奪武漢、北圍五台”。即說明日本把八路軍的五台與國軍的武漢放在同等的地位，又說明日本把兵力分散在南北兩個戰場，削弱其進攻力量，對於武漢會戰中，國軍取得豐碩成功是何等的重要。即令是剛組建的新四軍也對武漢會戰作了很好的配合。1938年6月17日粟裕部在鎮(江)句(容)公路上的衛崗，襲擊日軍汽車隊，擊斃少佐以下三十多人，繳獲槍支及敵軍車多輛，首戰告捷，蔣介石特致電“葉軍長，所屬粟部，襲擊衛崗，斬獲破多，甚

甚嘉尚，仍希督師，繼續努力，達成任務”。足見蔣介石對此次戰鬥的重視。新四軍在南京附近的活動，使原來守南京的日軍由3個聯隊增加到11個聯隊，牽制日軍向武漢進攻的兵力，有力配合武漢會戰。

中共中央在總結抗戰初期主要是武漢抗戰時期的成績時，明確指出：“十六個月來的抗戰，是我中華民族發展中的偉大歷史事件，造成了我中華民族空前未有的團結和進步。”<sup>10</sup>

中國自進入20世紀20年代以後，在政治舞台上兩個政黨起着舉足輕重的作用，這就是國民黨與共產黨。兩黨之間的關係如何，對中國的前途與命運至關重要。正如毛澤東指出的那樣：“中國的革命，自從1924年開始，就由國共兩黨的情況起着決定的作用。”因而國共兩黨的團結與合作，就成為全民族團結的中心環節，只要國共兩黨真誠團結，全民族就能夠很好的團結。在中共中央的文件中多次出現“擁護蔣委員長”<sup>11</sup>的詞句。蔣介石也多次表示應與中共密切合作。國共兩黨的團結為中華民族的空前團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 三、第二次國共合作為打敗日本侵略者 奠定了初步基礎

主要包括武漢抗戰在內的抗日戰爭初期，中國的抗日戰爭取得了重要成果，即通過從廬溝橋事變到武漢淪陷的16個月的抗戰，打下了戰勝日本侵略的初步基礎。正如毛澤東於1938年9月致蔣介石的信中所說：“十五個月之抗戰，愈挫愈奮，再接再勵，雖頑寇尚未戢其凶鋒，然勝利之始基，業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無窮……澤東堅決相信，國共兩黨之長期團結，必能支持長期戰爭，敵雖凶頑，終必失敗。”<sup>12</sup>抗日戰爭勝利的“始基”業已奠定，這個科學結論是很重要的，即經過武漢抗戰(包括1937年下半年抗戰)打敗日本的基礎已初步奠定。即此時的戰爭形勢不是中國滅亡的問題，而是已打下了戰勝日本軍隊的初步基礎。戰勝日本只是時間問題了。中共中央文件也有科學的論述，即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的政治決議案就明確指出：經過中國抗日戰爭的第一階段，即敵之

戰略進攻和我之戰略防禦階段的作戰，主要是武漢抗戰之後，已經“建立起持久戰之必要基礎”<sup>13</sup>，這裏又講了“基礎”就是戰勝日本的基礎已奠定。台灣出版的《抗日戰史》也明確指出武漢抗戰的作用是“誘敵陷入大江南北湖沼山嶽地帶，使優勢裝備無法發揮其效能，即可達成逐次消耗敵人的目的，又可粉碎敵人速戰速決之企圖，而奠定國軍長期抗戰之基礎”。國共兩黨均認為通過武漢抗戰奠定了打敗日本侵略的基礎。主要表現在：

### （一）從軍事上看，中國軍隊不僅保存了主力而且還有新的發展

日本狂叫三個月滅亡中國。實際上淞滬抗戰就打了三個月，進入“武漢抗戰”後經歷了四次正面戰場的大會戰，即徐州會戰、武漢會戰、南昌會戰和隨棗會戰。在這四次大會戰中，日本原計劃消滅國民黨軍隊的主力後迫使蔣介石投降或把國民政府降為地方政府。恰恰相反，國民黨軍隊在會戰中雖然傷亡較大，但主力仍然保存。特別是其精華部分能夠保存，換言之，國民黨軍隊並未大傷元氣。除個別例外，國民黨軍隊旅以上的建制始終沒有成建制的被日軍消滅。由於中國人口眾多，傷亡之官兵隨即加以補充，所以說國民黨軍隊的主力仍然得以保存。李宗仁在其《回憶錄》中說：台兒莊大捷後，日軍從四面八方包圍我軍，按戰略佈置而撤退。五十萬大軍有序撤退，日軍連俘虜中國軍隊一個上尉都沒有，這是戰爭史上的奇跡。<sup>14</sup>充分說明中國軍隊保存實力是多麼高超。從敵後戰場看，八路軍和新四軍挺進敵後，收復失地，開闢了五大根據地，即晉察冀、晉綏、晉冀豫、山東和華中根據地，猶如五根擎天柱，成為戰勝日軍的中流砥柱。八路軍與新四軍在“武漢抗戰”期間由5萬人發展到20萬人以上。毛澤東於1937年11月12日的報告中希望的：“如能在半年到一年內建立二十五萬到三十萬具有新的政治精神的軍隊……這是抗日戰爭轉入戰略反攻的軍事基礎。”<sup>15</sup>毛澤東的這個願望在武漢抗戰期間得以實現，即到1939年6月，八路軍新四軍已發展到約25萬人，這就奠定了打敗日軍的軍事基礎。這樣。中國軍隊不但未被日軍消滅，相反的得以保存鞏固和發展。正如中共六屆六中

全會公告全國同胞、全體將士和國共兩黨同志書中總結的那樣：“全國很多的英勇的抗戰將士已為國犧牲，然而幾百萬軍隊是鍛煉得更加堅強了。”<sup>16</sup>在中共中央的決議中也盛讚中國軍隊在武漢抗戰期間的成就，明確指出：“英勇的中國軍隊積蓄了豐富的抗戰經驗並正在鞏固其戰鬥力。”<sup>17</sup>這是對國共兩黨幾百萬軍隊的高度評價。這是戰勝日軍的柱石，這個柱石就是在主要包括“武漢抗戰”時期奠定的。這是了不起的成就。

從日軍方面看，中共中央文件已明確指出：通過包括武漢抗戰在內的16個月的抗戰，“我們打破了日寇的速戰速決的計劃，消耗了敵人數十萬兵力和數十萬經費，增加了敵寇內外的困難……日本帝國主義的法西斯統治是在殘廢的道路上向下發展”<sup>18</sup>，這是對日本侵略者的科學描述。從武漢抗戰以後，日本再也沒有能力向中國發動戰略性的進攻了，這是奠定勝利基石的根本條件。

### （二）從政治上，有三個“空前”為抗戰勝利奠定了政治基礎

一是空前的團結。抗戰前中國四分五裂，日軍乘隙而入。但“武漢抗戰”期間，以國共兩黨團結為基礎的中華民族大團結可以說是空前的，這是戰勝日寇最重要的政治保障，而正是在此時形成的，在中共提出的“國共兩黨長期合作萬歲！”的號召下，雖然後來很多摩擦，但卻能始終堅持到抗戰勝利。

二是空前的民主。集中體現在“國民參政會”於1938年7月7日在武漢成立，這是中國民主發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在隨後的艱苦歲月裏，國民參政會仍發揮很好的作用。如在重慶舉行的一次參政會上，參政員對糧食部長的質詢很尖銳，他竟昏倒在會場上。黃炎培等6名參政員於1944年運用參政員有調查權到延安調查發生了很好的影響。這都是在武漢時期奠定的基礎。

三是空前的進步。以武漢為中心全國各地高舉抗日的旗幟，發奮圖強，蒸蒸日上的政治氛圍十分濃厚。這個傳統也得到發揚。

總之，在武漢抗戰時期奠定的政治基礎十分重要。當國民黨從三個空前後退時，中共提出：堅持抗

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號召。維護了抗戰的政治基礎。

### （三）從文化上看，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已昇華到新的高點

如果說義勇軍進行曲中提出的：“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在抗戰前還是一個口號和希望。而通過“武漢抗戰”已成為現實。愛國犧牲、民主求實、自強自立、抗戰必勝、中華必興、奉獻人類等中華文化已得到昇華。美國歷史學者麥金農教授稱這些為“武漢精神”，充分說明“武漢抗戰”時期已築牢戰勝日軍的文化基礎。

### （四）從教育上看，學校內遷為打敗日軍奠定了人才基礎

戰爭不僅是軍事力量的較量，也是人才的較量。在“武漢抗戰”期間，由於爭取了時間，各淪陷區的大中專學校紛紛內遷，如著名的西南聯大(北大、清華、南開三校聯合)，經過武漢、長沙最後遷到昆明。武漢大學遷到四川樂山，復旦大學遷到重慶，河南大學遷到豫西等等。中學內遷的也很多，如湖北省政府把在武漢附近的中學遷到鄂西北的鄖縣，分別成立“聯中”，鄖縣的“聯中”也稱為“八高”等等。大批學校內遷是在“武漢抗戰”時期進行的，為打敗日軍奠定了教育和人才的基礎。

### （五）從經濟上看，工廠內遷為打敗日軍奠定了物質基礎

在“武漢抗戰”期間沿海和中部地區的工廠企業紛紛內遷西南和西北。著名的工廠企業就有400家。這些工廠遷到大後方後，又帶動了西部工礦企業的發展。它們生產戰時所需要的各種產品，為戰勝日本奠定了物質基礎，特別是宜昌成為工廠內遷的轉運總站，宜昌人民奮戰幾百個日日夜夜把機器設備運往四川，被人們譽為“敦刻爾克大撤退”。

### （六）武漢抗戰時期重大成果之一是國共兩黨的領導機構都得到了鞏固

在民族危機關頭，兩黨的領導集團的穩定是極為

重要的。正是在武漢抗戰時期都得到了很好的解決。從中共方面來看：武漢抗戰開始時，王明的右傾錯誤在中共中央還有一定的市場。也就是毛澤東所說的他曾被光榮的孤立。但在武漢抗戰將結束時召開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進一步確定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sup>19</sup>，中共更加成熟，這就是保證中共在抗日戰爭中發揮中流砥柱作用的最重要基礎。

從國民黨方面看：在其臨全大會上選舉蔣介石為其總裁是很重要的。就是為“有一個穩固之重心”，大會決定確立領袖制度，並推蔣介石為總裁。國民黨歷史上曾實行總理制，孫中山死後，即無法定的領袖。此次實行總裁制，一方面是對孫中山的尊重(只有孫中山才能稱總理)，另一方面也標誌着蔣介石在國民黨內的統治地位得到進一步強化。儘管蔣介石借此實行個人獨裁，但在中日戰爭異常艱險的形勢下，也是需要的，因為在正面戰場有一個穩定的最高指揮中心是很重要的。一個有權威的最高統帥就為爭取抗戰勝利創造了重要條件。

### （七）武漢抗戰是八年抗戰中的重要轉折點

武漢抗戰之所以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原因之一就是它是一個重要的歷史轉折點，即中日戰爭由日本戰略進攻和我之戰略防禦，轉變為雙方進入戰略相持階段。沒有奠定打敗日本的基礎是不可能有一個關鍵的轉折，這個轉變很重要，帶來了一系列的變化，表現在以下方面。

#### 1. 日本對華政策的調整

日軍攻佔廣州與武漢後，其兵力佈置是在關內有24個師團，關東軍有8個師團，國內只留1個師團。由於在包括武漢抗戰在內的18個月時間，其兵力傷亡人數已達近50萬人。此時日軍戰綫延長，兵力分散，士氣也很低落，經濟上也陷入困境，靠借貸打仗。

在中國方面。中共領導的敵後戰場日益擴大，已形成獨立的廣大敵後戰場，對日軍構成日益嚴重的威脅。而在正面戰場上，國民黨軍隊在武漢周圍的南昌、襄東、湘北、鄂西、廣西南寧地區、山西中條山、綏遠西部地區繼續對日軍進行防禦性作戰。這樣，就形成了敵後戰場與正面戰場互相支持、互相配合進行持久抗戰的大好局面。加上日軍侵略野心的擴大，既

要準備對蘇作戰，又要同英美爭奪太平洋。它能用於中國戰場的兵力已接近極限，因而不得不停止對中國正面戰場的戰略進攻，這正是武漢抗戰結出的碩果。

在此形勢下，日本在堅持其滅亡中國的總方針下，不得不調整其對華策略。主要是以戰養戰的策略，武漢抗戰時期，日本重視國民黨，輕視共產黨，認為共產黨只不過是領導農民在打一些小小的遊擊戰罷了。武漢抗戰結束時，共產黨已建立五大根據地的基礎，他發現這是對日本很大的威脅，因而逐漸將其注意力集中在打擊和消滅八路軍和新四軍方面，對於國民黨政府則從武漢抗戰時期以軍事打擊為主轉變在軍事打擊的同時，還輔以政治誘降的方針。

### 2. 國民黨對中共政策的變化

武漢抗戰結束後，由於日本的誘降和英美對日的綏靖政策，特別是八路軍和新四軍開闢了五大根據地等各種原因，蔣介石集團對中共政策發生了變化。其標誌是 1939 年 1 月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制定了“溶共”、“防共”和“限共”的方針。隨後又成立了反共的“特別委員會”。制定了《防制異黨活動辦法》等一系列反共文件。武漢抗戰時期兩黨的“蜜月期”遂告結束。取而代之的是國民黨不斷製造摩擦事件。

### 3. 英美等國對中日戰爭政策的調整

武漢抗戰之所以有重要歷史地位，就是它改變了國際形勢的狀態。如迫使英美調整對華政策就是突出一例。武漢抗戰結束時，日軍佔領了中國的主要富庶地區，嚴重威脅它們的在華利益，必然要對日本採取限制行動。同時，又看到中國軍民抗日的意志和能力。已奠定了打敗日本的初步基礎，因而有必要在對日實行綏靖政策的同時，調整自己對中日戰爭中的政策。日本在武漢抗戰結束時，成立“興亞院”，提出要建立“東亞新秩序”。1938 年底和 1939 年初，英、美、法三國分別向日本遞交了不承認“東亞新秩序”的照會。1938 年 12 日，美國政府首次宣佈向中國提供 2,500 萬美元借款，中國用桐油償還。英國則於 1939 年 3-8 月，向中國提供 500 萬英鎊的借款和逾 300 萬元的信用貸款。<sup>20</sup>

總之，從以上七個方面可以看出，武漢抗戰為打敗日本奠定了初步的基礎。

## 四、國共合作奠定戰勝日本強敵基礎

第二次國共合作經歷了醞釀、形成、高峰、摩擦、分裂的發展階段。1938 年“蜜月期”，國共密切合作，才奠定了打敗日本侵略的初步基礎。這個寶貴的經驗給我們很多的啟示，主要有以下幾點：

### (一) 對“屈原論”與“蘇武論”的有力駁斥

本來，在武漢抗戰時期，由於國共親密合作已奠定了打敗日本的初步基礎。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已明確指出：中國具備了戰勝日軍的基礎“個把日本帝國主義是不夠打的”。而武漢抗戰已奠定了初步的基礎，因而打敗日本侵略者已經是不能不實現的問題，而只是時間問題了。因為毛澤東認識到只要國共兩黨緊密合作，就一定可以創造奇跡，就一定可以打敗日本侵略。這就是說 1938 年武漢抗戰時期就已奠定了打敗日本侵略的初步基礎，而日本卻散佈他並不是被中國打敗的，一貫看不起中國，日本認為他是被美國和蘇聯打敗的，特別是被美國打敗的。這種認識一直延續了 70 年。在這種歷史觀和戰爭觀的影響下，廣泛流傳着“屈原論”與“蘇武論”。

所謂“屈原論”不是說的楚國的屈原，而是指美國在日本投下兩顆原子彈，才迫使日本投降。對此，早在 1945 年抗戰勝利前夕的 1945 年 8 月 13 日，毛澤東就在《抗戰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一文中明確指出：“原子彈能不能解決戰爭，不能。原子彈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彈而沒有人民的鬥爭，原子彈是空的。……我們有些同志也相信原子彈了不起，這是很錯誤的。這些同志看問題，還不如一個英國貴族。英國有個勳爵，叫蒙巴頓。他說，認為原子彈能解決戰爭是最大的錯誤。我們這些同志比蒙巴頓還落後，這些同志把原子彈看得神乎其神。”<sup>21</sup> 毛澤東在這裏說的很清楚，就是沒有中國人民與世界人民群眾為打敗日本奠定堅實的基礎，兩顆原子彈不可能使日本投降。它只能起到加速日本投降的進程，而不能起基礎性的作用，起決定性的作用必然是人民的反法西斯鬥爭。

所謂“蘇武論”，不是說的漢代蘇武出使北方的故事，而是認為只有蘇聯紅軍出兵中國，像摧枯拉朽

般的消滅了日本百萬關東軍，才迫使日本投降。這種看法也不符合歷史事實。固然，蘇軍出兵中國東北的確發揮了很大作用，但起決定性作用的還是東北人民進行十四年之久的抗日鬥爭和全中國人民進行的八年抗戰。包括武漢抗戰為打敗日本奠定了初步基礎。對此必須有全面的認識，不能強調某方面的作用而否定其他方面的作用。

總之，武漢抗戰奠定了打敗日本侵略的基礎這個鐵一般的歷史事實是對“屈原論”與“蘇武論”等錯誤認識的有力批駁。

## （二）國共兩黨的密切合作是振興中華的重要法寶

抗日戰爭關係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在這歷史的關鍵時刻，國共兩黨緊密合作，共同抗日，譜寫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壯烈史詩。在西安事變前，國共兩黨拼死廝殺，嚴重削弱中國的力量，日本乘虛發動“九一八”事變。國民黨仍不放棄消滅中共的方針，而繼續內戰，日本得寸進尺，入侵華北。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在此生死關頭，國共兩黨都認識到只有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才可能挽救民族於倒懸，因而在西安事變後，開始進行第二次國共合作的談判但進展緩慢。日本認為此時是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良機，因而發生了盧溝橋事變。此時國共兩黨雖然加緊談判，但兩黨關係並未達到應有的合作程度。日本很快佔領上海與南京直逼武漢。中國大半富庶地區陷入敵手。在這命懸一綫的時刻，國民黨認識到與中共緊密合作迫切性與重要性，因而加強了與中共的合作，帶來了“蜜月期”。正因為親密無間的合作，才取得武漢抗戰的重大勝利。這個歷史經驗是很寶貴的。只要國共兩黨精誠團結，就可金石為開，就會開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否則，適得其反。這個歷史經驗對今天來說仍有其生命力。只要國共兩黨密切合作，就可以創造出人間奇跡。

## （三）國共兩黨應反對外國對兩黨合作的破壞與干擾

日本深知只要國共兩黨攜手合作就會給日本侵

華行動造成極大的威脅，因而千方百計破壞國共合作。日本制訂的武漢會戰計劃中就有切斷國共合作的重要內容。其中規定：“佔領武漢，以切斷國民黨戰場和共產黨戰場之間的聯繫，並可造成國共分裂，從而摧毀抗日戰爭最重要的保證——國共合作。”<sup>22</sup>為達到日本這個罪惡的目的，除了在軍事上打擊國共兩黨軍隊的同時，用盡一切辦法分裂國共合作。在武漢抗戰時期也是動作頻繁。如當南京淪陷後不久，武漢抗戰剛開始的時候。日本外相廣田於1937年12月23日通過德國駐華使節陶德曼提出與中國政府和平談判的三個條件，其中第一條就是：中國政府應拋棄聯共政策及反日反滿政策，並與日滿共同反共。<sup>23</sup>可見日本對於破壞國共合作是多麼的重視。除苛刻條件外，還要求“限年內答覆；派遣媾和使節到日本指定的地點；在承認全部條件之後開始締結停戰協定。”面對這個嚴酷的條件，特別是陶德曼“調停”之事洩密，中共與全國人民堅決反對屈辱求和，蔣介石政府遲遲不予回覆，直到1938年1月13日才通過陶德曼要求日本對每個條件具體的說明後才能最後決定是否同意，實際上是拖延戰術，日本惱羞成怒，於1938年1月16日發表《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政府聲明》。也就是公開要與國民政府絕交。這一方面說明日本的侵華本性不會改變，同時也說明蔣介石抗戰還是積極的，與中共的關係也比較好，維護了兩黨的團結，使第二次國共合作進入了“蜜月期”。正是因為蔣介石與此時中共的密切合作，才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這個歷史經驗也是很寶貴的。某些國家要想消滅中國、侵略中國、遏制中國，可以用各種手段進行。但其中重要的一個手段就是挑撥兩黨關係。在武漢抗戰時期是這樣，現在仍是這樣。我們應牢記歷史經驗，高度警惕外國敵對勢力的這個陰謀。國共兩黨均應獨立自主的解決自己的問題。決不應挾洋自重。中國的所有政黨都應牢記這個歷史經驗，不受外國勢力的挑撥而團結一致振興中華。正是在武漢抗戰中國共“蜜月期”才奠定了打敗日本侵略的初步基礎。造福中華民族，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事業向前推進了一步。中華民族應永遠記着這個寶貴的經驗。

註釋：

- <sup>1</sup> 見《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89頁。
- <sup>2</sup> 見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第696頁。
- <sup>3</sup> 見《周恩來政論選》(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223-227頁。
- <sup>4</sup> 見《周恩來選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12-220頁。
- <sup>5</sup> 同註2，第376頁。
- <sup>6</sup> 同上註，第487頁。
- <sup>7</sup> 榮孟源主編：《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下冊)，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6年，第484頁。
- <sup>8</sup> 同註2，第491頁。
- <sup>9</sup> 時事問題研究會編：《抗戰中的中國軍事》，1940年，第30-31頁。
- <sup>10</sup> 同註2，第695頁。
- <sup>11</sup> 同上註，第582頁。
- <sup>12</sup> 王功安、毛磊主編：《國共兩黨關係通史》，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1年，第640頁。
- <sup>13</sup> 同註2。
- <sup>14</sup> 見《李宗仁回憶錄》(下)，南寧：廣西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0年，第749頁。
- <sup>15</sup> 同註1，第390頁。
- <sup>16</sup> 同註2，第717頁。
- <sup>17</sup> 同上註，第697頁。
- <sup>18</sup> 同上註，第695頁。
- <sup>19</sup>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下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第662-663頁。
- <sup>20</sup> 《日本帝國主義對外侵略史料選編》(1931-194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49頁。
- <sup>21</sup> 見《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33-1134頁。
- <sup>22</sup> 毛磊等：《武漢抗戰史要》，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26頁。
- <sup>23</sup> 同上註，第59頁。